



奥朗德宣布
法国处于战争状态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布将继续对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进行军事打击。他表示，法国目前处于战争状态，这不是一场文明的战争，法国打击的是与全世界为敌的圣战分子。



美国博物馆买下
中国古宅重建

美国迪美博物馆收藏有大量东亚艺术精品，其中最令该馆引以为傲的就是荫余堂。1997年，美国人到安徽黄村买下荫余堂，拆下一砖一瓦，原封不动搬到美国。据悉建成后第一天排队参观的人数就上万。



英国性感辣模车手
逐梦漂移赛场

拥有完美身材的性感女模Michelle Westby却一直想要在男人的世界里闯出一片天。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漂移赛车手。



新西兰一女模特
一次吞吃22个汉堡

新西兰奥克兰市22岁的美女模特内拉·梓塞尔在一小时之内吃下22个巨无霸汉堡，这些食品的热量超过1.2万卡，重量达到10.6磅(约9.6斤)，相当于一个初生婴儿的重量。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父亲牺牲时，他出生仅8个月零25天。作为烈士遗孤，他继承父亲遗志，无论是当农民，还是当工人，无论是在央属企业，还是在地方国营企业，他都踏实肯干。后来，他一步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2008年退休后，他利用6年时间，探访了130余位革命烈士的家庭，饱含深情地记录烈士事迹，慰问烈士遗属，自觉弘扬烈士精神。他叫孙增彦，本报记者日前在青岛专访了他。

孙增彦：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烈属群体

□ 本报记者 逢春阶 王磊

操劳大半生，本可安享天伦之乐。可是孙增彦比退休前更忙了，这个倔强的人，要完成一个心愿，寻访烈士家庭。“无数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烈士身后亲人的现状。如果我这一辈人再不关注，恐怕就没人知道过去的事情了。”孙增彦说。

近日，记者来到青岛市黄岛区九顶山小区孙增彦的家，但见他家的书房里堆着《第三野战军战史》、《淮海战役》、《粟裕回忆录》、《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济南战役》、《中共胶南地方史（一卷）》等党史、军事史研究资料。这是他必备的精神食粮。

他一边小心地翻阅着自己手写的采访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走访的130位烈士家庭的情况，一边饶有兴致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长达6年的探访经历。

“我是烈士家属”

1983年夏天，石油部第七工程公司大连项目工程处的几名工人利用休息时间聚在一起侃大山。这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子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聊人生。年龄最长的孙增彦率先介绍，“我叫孙增彦，来自山东胶南，父亲是一名烈士。”

孙增彦的父亲，名叫孙万秋，排行老三。他自小聪颖，在兄弟三人中出类拔萃，私塾九年，读尽“四书”、“五经”，练就一手好算盘，凭着两手同时打算盘的硬功夫，得到当时胶南县城一家大商号老板的器重而担任主管会计。

1947年夏天，本来组织上安排孙万秋二哥哥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孙万秋担心二哥哥脾气暴躁，怕到了部队惹事，遂决定替二哥哥参军。孙万秋于1947年农历七月三十穿上军装上了前线，依次参加了诸城、平度、高密、胶州、莱阳等战役。

1948年11月14日，孙万秋牺牲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碾庄战役的彭庄战斗中，年仅二十四岁。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并不好，孙万秋牺牲的消息一直到1950年冬天才传递到孙增彦的家中。全家人盼望星星盼月亮最终却盼来了一张由山东省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书，上面有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康生以及副主席郭子化的签字。

得知孙万秋牺牲的消息，孙增彦一家陷入了极度悲痛当中。当时还不到三岁的孙增彦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跟着一起哭。从此之后，孙增彦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

“刚开始还好，二大爷一直帮忙，我也没有体会到没有父亲的烦恼。”孙增彦回忆说，“二大爷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帮我们母子，是因为我父亲是代替他参军的。”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赶上大饥荒时代，人们都是吃不上喝不上的，谁也顾不上谁，“没有水喝，我母亲就挑着水桶去一里外的井里挑水，她是小脚，走路歪歪扭扭，本来就费劲，再挑上两桶水，就更费劲了。”

除了生活中的艰辛，父爱的缺失也让孙增彦备受煎熬。“文化大革命”时，学校分“红五类”、“黑五类”。孙增彦说，“我是烈士子弟，按理说应该是‘红五类’，但是因为姥爷是地主，红的不算黑的算，就被打成‘黑五类’，被人批斗。当时，很多人都有爸爸来看望他们，但是我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没有父亲的无助，也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也正因为这是“黑五类”的缘故，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孙增彦错过了考大学的机会。1968年，孙增彦从胶南一中毕业后，按照当时的政策，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1976年底，由于国家照顾烈士子弟，他才端起了“金饭碗”，在石油部第七工程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从农民变成了工人。

后来，公司在大连有一个工程项目，孙增彦被调往大连工作。1986年经过刻苦努力，他获得了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批大专毕业文凭。

孙增彦的个人经历引起工友们的巨大兴趣，有一名工友表示，“增彦，你的经历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不如把经历写成小说吧。”虽然工友只是随便一说，但是孙增彦却把话记在了心里。当时，孙增彦就下定决心，“退休之后，就去实现这个愿望。我不仅要写我自己，更要写和我同命运的人，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群体。”



孙增彦向记者介绍他调查整理的资料。

王磊/摄影

“骑自行车满胶南跑”

尽管孙增彦早在1983年就产生了寻访烈士家属的想法，但一直没有实施。1989年5月，孙增彦调回山东，在青岛开发区工作。回到老家，他寻访烈士家属的愿望更迫切了。但因为要养家糊口，还抽不出时间来寻访。直到2008年底，从工程岗位上退休的孙增彦才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全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烈士，该怎么下手？从何处下手？思考再三，孙增彦决定将范围缩小到家乡胶南的农村。

他说：“我是农村长大的，母亲也是在农村把我拉扯大的，非常不容易。推己及人，我想知道那些在农村和我同命运的人，他们现在怎么样？就想着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再就是考虑到经济因素，我只能从身边人开始。”

刚开始，孙增彦只是以电话形式采访。孙增彦回忆说，“第一个开始采访的对象是在2009年底，我记不太清楚具体是哪一天了。最早从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开始，他父亲就是烈士。经过和朋友打听，知道他在胜利油田工作，就马上打电话了，当时谈了一个多小时，收获很大，也很有成就感。”

孙增彦觉得，打电话虽然也能获得很多信息，但是不如面对面交谈更能直观、深入了解他们的情况。从2010年春天开始，孙增彦决定登门拜访，并且给自己制定了100人的目标。

为了减少费用开支，孙增彦专门去买了一辆自行车，他说，“骑自行车最合适，既省钱又方便，还可以锻炼身体。”

另外，为了更好地记录烈士家属的生活现状，孙增彦又自费买了一部数码相机。每天早晨天刚亮，孙增彦就开始收拾行囊，简单吃点早餐后，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近的一般半个小时就到了，远的就可能一个小时甚至更长。”

孙增彦采访烈士家属时，总是习惯性脱口而出，“我们是同命运的人。”不管是家庭状况好的还是家庭状况差的，因为都是烈士家属，大多数人听到这句话都是暖暖的，“因为共同的命运，我们的距离一下子就被拉近了。”

忙活半天之后，孙增彦也不好意思在别人家吃饭。每次都会找个借口去找个地方一个人吃点。

孙增彦说：“我吃饭也很简单，两个馒头，一个胡萝卜或者一根黄瓜，再从家里捎着一壶水，到了中午，他们会留我吃饭，我就马上撒个谎说村里还有个同学已经说好了在他那里吃，实际上是去村头没人的地方垫垫肚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增彦去原胶南市民政局办事，看到了一份烈士名录。上面记录了原胶南市两千多名烈士的名字及住址。这对于此前毫无头绪的孙增彦来说，如获至宝。他马上

和民政局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复制了一份。此后，孙增彦找人就按照这份名录去找，“里面烈士有两千多人，我只选择和我父亲差不多年份入伍的烈士。”

再后来，孙增彦又听说青岛早就有一个英烈网，网上全面的信息让孙增彦大开眼界，“从名录上只能看到某某村某某烈士，但是哪个部队的，在哪里牺牲的，都没有。上这个网一部都很清楚，就按照网上给的地址去访问。”

但是对于已经年过六旬的孙增彦来说，使用电脑上网，似乎是不小的障碍。为了能够更多了解相关烈士的信息，孙增彦只能现学，开始就是“一指禅”，后来已经可以熟练上网浏览。

他们需要关爱

2012年，孙增彦走访胶南市柏乡镇常家庄，去拜访北独立一团二营三连牺牲烈士孙玉茂的儿子孙喜秀。

可是左打听右打听，村里的人竟然不知道有这户人家。直到遇见一位村里负责打扫卫生的老人，这才有了眉目。

当孙增彦看到孙喜秀本人后，眼泪差点流了出来。破旧的屋子里只有一位疾病缠身的老人躺在炕上，头发乱糟糟地蓬松着，大概有半年没有理发了。在他身边有一床破破烂烂的被子。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人就是烈士孙玉茂的儿子孙喜秀，更想不出在大炼钢铁的时代，孙喜秀还是生产队长。

孙增彦试图用那句百试不爽的问候语“我们是同命运的人”与其打招呼，但是并没有得到孙喜秀的回应，因为年过七旬的他已经失聪多年，根本听不清别人讲话。

无奈之下，孙增彦只能和打扫卫生的老人交流。老人介绍说，“孙喜秀有三个儿子，但是都忙。本来小儿子出了车祸，和他一起住，好了之后就出去打工了。他一走，家里就剩下老头自己。以前老孙在暖和天时还能够上街买个馒头，没有卖馒头的时候就跑去门市部买饼干，根本吃不上菜。老头一年的生活费全靠政府发的一千多块钱。”

孙增彦听后，心里很难受，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临走之前，孙增彦掏出自己兜里仅有的一百块钱塞给了孙喜秀。结果，孙喜秀一点都没有推辞，就拿过去了。孙增彦说，“如果不是非常困难，谁会这么在乎一百块钱。在农村，大家都很爱面子，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推辞。”

之后，孙增彦又去了一次常家庄探望孙喜秀，还特意买了一把推子来给他理头发。或许是孙增彦的做法感动了孙喜秀的儿子，后来孙喜秀不小心骨折了，他的三个儿子开始轮换赡养老人。孙增彦说：“我一直和他

在外面打工的小儿子保持联系，听他说，大哥、二哥轮换养，他自己回不去，就每月给大哥、二哥钱，让他们帮忙照顾。”

孙喜秀还有政府发给烈士家属的每月一百多块钱，同样年过七旬的徐瑞莲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当孙增彦去她家拜访时，她正在放羊。

原本徐瑞莲也应该是烈士家属，她的父亲徐德江在原藏马县民兵一大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在父亲牺牲后不久，她的母亲又因病去世。在家中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徐瑞莲被家住胶南琅琊镇的姥姥收养。从此，烈属待遇也随之消失。

据徐瑞莲回忆，在她小时候，曾经被邀请去读烈士子女小学，但是她母亲不让她去。孙增彦说，“他们村里活着的老军人，还曾经联合出示证明，证明徐瑞莲父亲是烈士。他父亲是运送粮食的民夫，徐瑞莲是夫属。同样是出夫，有的人成为了烈士，有的人就不是。徐瑞莲十岁就没有了母亲，她姥姥把她带大，到了另外的公社，从此烈士的事不了了之了。”

徐德江虽然没被追认成烈士，但是村里人都知道，因为不少人是和他一起去送粮，目睹了他怎么死的。没有烈士证，村里就自费来照顾他的女儿徐瑞莲。

烈士的弟弟张赞培

到烈士张环培家寻访，孙增彦先后去了五次，最早的一次是2012年，他见到的是烈士的弟弟张赞培，一个心地善良、正直的人。

张环培是原胶南县海崖公社顾家崖头大队人，1927年生，1947年5月参军，战士，生前所在部队是华野七纵十九师五十六团，1948年4月（青岛市英烈网记载，孙增彦考证应是5月底）牺牲于山东泰安。

孙增彦查资料发现：泰安战斗是华野山东兵团（曾称东线兵团、内线兵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自1948年5月29日发起至7月15日结束的津浦路中段战役的一部分。5月29日晚，在许世友、谭震林的指挥下，鲁中军区围攻泰安，七纵在泰安以南、十三纵在泰安以北，准备打济南、兖州的援敌。泰安敌军迫于我军威力弃城逃跑。同月30日，山东兵团收复泰安、新泰两县城。张环培就是在这两天牺牲于泰安的。

共和国诞生那年，老父没接到烈士证，第二、第三年仍没见到烈士证，第四、第五年还没有烈士证……老父断定张环培活着，一定活着，八年，九年，都平安无事过去了。

张环培烈士牺牲的第十个年头，父亲收到了儿子的烈士牺牲证明书。巨大的失望像暴风骤雨袭击着父亲，袭击着这个家。

“环培结婚刚满一个月的妻子，送夫参军时，盼的是丈夫早日打完仗回家，男耕女织，过上团聚安稳的日子。待到村里一男参军青年的青年了回家了，尽管残疾；有的虽没回家，却有了在某日某地牺牲的活信。丈夫既没回家，也没死信，那该活着是活。日盼，夜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十年可是三千六百五十天啊。须知妻子才二十九岁啊。原来‘盼’字竟然是如此折磨人的字眼，又经过数月思索，妻子决定舍弃自己如女儿的婆婆，带着抹不去的伤痛，改嫁到远处去。”孙增彦深情地说起他寻访的感受，“男人牺牲了，妻子难到什么程度，无法形容。”

得知儿子牺牲的当年，烈士的父亲经受不了打击，不幸病逝。5年后，烈士的母亲撒手人寰。撇下十四岁的孤儿、烈士的弟弟张赞培。原胶南县民政局自费成为孤儿那日起，每月发放四元钱抚恤金，一直到十八周岁。

孙增彦说：“张赞培远嫁青岛西镇的姐姐，打算把弟弟接到他们家居住。姐夫担心这么小的弟弟和自己的孩子们打架，恼怒了再回老家反而不好。没想到，小小年纪的赞培很懂事，在姐姐家里，很让人省心。可是姐姐家只有一间屋，孩子们睡铺挤不下呀。”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还是得回家居住。最现实的困难是做饭。张赞培向邻居学习怎样煮地瓜干，怎样洗菜、切菜、炒菜；怎样节约使用平均每月只有半斤的花生油；为了节省柴草，怎样在锅底炒菜，算子上留饭。从生一顿熟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地瞎凑合，慢慢地到顿顿能上热饭、熟饭。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荒岁月里，当地农村供应地瓜干的标准是十天四斤，每十天供应一次。为了让半大小子张赞培多吃点，大队干部想方设法给他每次多三斤。

1964年，大队干部安排张赞培任大队油坊的会计。十五周岁的会计，在当年的海崖公社乃至更大的范围，恐怕是最小的了。

那时，每斤花生米的加工费含税是二分二厘二毫五，税要打完油后一次性缴纳。头一年缴税前，唯恐出错，张赞培在家算了又算，直到自认为确凿无误了才去公社税务所。税务员老刘嚼着烟斗打完算盘，报出的数比他预先算好的数少了整整十元钱。张赞培很有把握地告诉他：“你算得不对。”老刘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张赞培，反问道：“不对？”张赞培点了点头。他很不情愿地低下头又算起来，嚼着烟斗，嚼着烟斗，连算了三遍，离开座位，税务员老刘走到小赞培面前用吃惊又赞赏的眼光看了一会，摸着他的头摸着外地口音连声夸奖：“你这个小孩真好，你这个小孩真好。”

“十元钱，如今在很多人手里不算什么，可那时能做一身相当不错的衣服！张赞培真是个好会计，做到了分文不差。”孙增彦说。

当了两年小会计，大队干部派张赞培回生产队任保管员。这个官不大，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实权派。钱、粮、物样样都管。

张赞培对孙增彦回忆：“保管员，我干就是十八年，直到1983年实行土地大包干。这可不是我躺着要干的，一年一年都是我们生产队二三百口子人投票选举的，不干都不行。又把扫帚扬场锨、铲头犁子使牛鞭，那样不得我买？听说现在为公家买东西要什么‘回扣’，真是不可思议。我当年别说‘回扣’，恨不得一分钱掰开两半花，节省再节省。虽然当年经济不发达，每年经手现金不多，可十八年俺可没出过一分钱的差错。”

艰难岁月，把张赞培打磨成一个豁达的人，什么事情都看得开。当孙增彦问起母亲的死因时，六十六岁的张赞培很坦然地回答：“和大哥牺牲没大有关系。”

“多么好的烈属，我们怎么能忘了他们呢。”孙增彦感叹。

“下一步，寻访全国范围烈属”

孙增彦早在2014年就已经完成了寻访100名烈士家属的目标。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脚步，至今，孙增彦已经拜访了131名烈士的家庭。

对于孙增彦的举动，家里人一开始非常不理解，儿子不止一次地劝他不要再干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别人退休了，都是在家里享福，他退休了，却非要去受罪。”全家人都清楚老孙的脾气，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慢慢地，家里人也就习惯了，儿子还专门为孙增彦买了一个大水壶。

不仅仅是家人不理解，孙增彦的朋友也觉得他是“多管闲事”，当然也有人对他的行为表示认同，“增彦，我们退休了光要了，你这退休了还干这么有意义的事。”

但不管是质疑声也好，支持声也罢，孙增彦都不在乎，“我只是要实现若干年前的愿望。其实生活上并不感觉苦，这毕竟是自己感兴趣的，每了解一户家庭，都很有成就感。费用上，我紧巴着花，再就是我家条件允许，就是把我的养老退休金都搭上呗。”

孙增彦说，“下一步我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找，现在我有经验了，先去档案馆查阅。”

让孙增彦感到欣慰的是，2012年清明节，他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华野六纵烈士名录》上发现了父亲孙万秋是“中共党员”的信息，请纪念馆出具证明，上报省民政厅。2014年换发烈士证，父亲的“中共党员”身份写入了新证。

孙增彦还说，“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把这些烈士家庭的情况写成书，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群体，也让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们。”